

阮清越《同情者》：

越南人的越战

□王 凯

阮清越是美国越南裔作家和评论家,1971年出生于越南邦美蜀。1975年,西贡陷落后随父母移居美国,与家人在难民营熬过一段艰难时日后定居加州圣何塞。1997年,阮清越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博士。2016年,凭借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同情者》一举斩获普利策小说奖和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处女作奖等多项美国文学大奖。他现为南加州大学英语系、美国研究与族裔研究系教授。

阮清越虽不像《同情者》中的主人公“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但他的的确确又像是小说里的“我”,是“能从两边看问题的人”。而越战恰恰是个具有两面性的问题,是美国和越南都难以回避的“悲剧”,只是问题与悲剧的阐释者和叙述者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悲剧的内容与结局不同罢了。

美国叙述、阐释越战的经典之作莫过于好莱坞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现代启示录》。在该影片中,科波拉从美国人的视角出发,透过电影镜头审视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以及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人性黑暗面。尽管该电影在国际上获得无数重量级的奖项,但对作为越南裔美国人的阮清越而言,科波拉以美国为中心的越战叙事及越南人在“美国人的越战”中的缺席是难以接受甚至是无法容忍的。在《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一文中,阮清越如是写道:“《现代启示录》让我看到美国水兵如何屠杀满满一船板的平民,看到一个叫马丁·西恩的美国军人如何残忍枪杀一个受伤的妇女……电影里的场面虽然是虚构,但也让我愤怒得全身发抖。”更令他气愤的是,“无论活着的还是死亡的南越老兵,在美国人眼里,不属于‘越战老兵’。美国人认为,他们保护了越南人,拯救了越南人,越南人要做的是对美国感恩戴德”。由此可见,越战在美国的叙事体系中,被扭曲为一场美国人的越战,而那些饱受战乱越南人和参战的越南士兵则被贬损为战争中的陪衬和被拯救的对象,死难的300万越南人就如同是炮灰,仿佛从未在美国人的记忆中存在过。

今年11月15日,阮清越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题为《我热爱美国,所以我必须讲真话》(*I Love America. That's Why I Have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It*)的文章。在文章中,阮清越对越南人身份的评判颇具洞见。他认为,“成为越南人应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就像成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一样。对我来说,只要我还有越南人的感知,只要有关越南的一切还能令我为之动容,那我就还是一个越南人。这就是我热爱越南的方式……这就是我感知我的越南性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情者》恰如其分地彰显了阮清越对越南的热爱以及他对自己身上越南性的感知和体认。他充分利用主人公的两面身份颠覆了美国人的越战叙事,讲述了一个越南人的越战。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混血儿,母亲是北越人,父亲是法国神父。自出生起,他就总是被别人污蔑为“杂种”。中学时,他结识了敏和邦,三人歃血为盟,成为出生入死的至交。后来,在敏的感化下,“我”笃信共产主义,加入越南共产党。上世纪60年代,“我”被组织派往美国的西方学院接受间谍训练。期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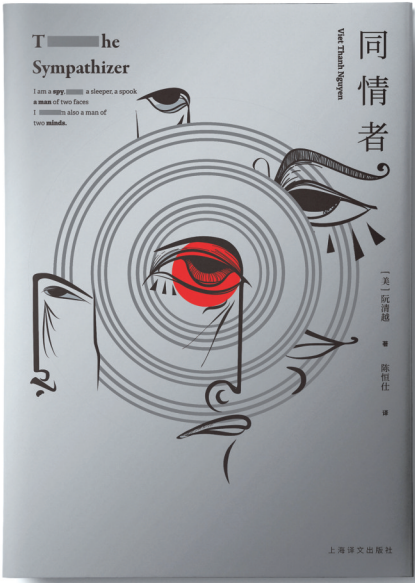
研习美国的文学和历史,精通英语的文法,掌握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通。学成回国后,“我”打入敌人内部,潜伏在将军身边做卧底。西贡陷落后,又经过千辛万苦跟随将军经关岛、圣地亚哥的难民营,最终流落到洛杉矶,继续通过敏为北越提供情报,并最终在失去越共信任后沦落为颠沛流离的船民。从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小说中的“我”具有三种不同的双重身份:双重的血统身份、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身份。这些特殊的双重身份不仅为“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双重视角,还使“我”在审视美、越两国过程中具有了某种世界主义情怀,“永远同情最最被轻贱的人”。

得益于主人公的双重视角,阮清越对越战叙事的重构是从对美国越战叙事的颠覆和批判入手的。在这部小说中,他彻底推翻了美国人在越战中的英雄形象和美国越战叙事中的拯救主题,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视为背信弃义的伪君子。

整部小说是以西贡陷落前南越人竞相逃亡的混乱场面开场的。在北越军队的猛烈攻势下,南越军队节节败退。面对朝不保夕的西贡,美国人无情地放弃了对南越军队的军事援助。当“我”打电话为将军安排逃离越南的飞机时,克劳德一句不痛不痒的“我看看下一步怎么安排”让“我”对美国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彻底破灭。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对南越的援助,放弃了整个越南,而不是像“我”所想象中的那样,“大批美国轰炸机该会很快飞临南越上空,或者说,美国武装直升机该会很快空投部队,营救我们。”为此,将军在撤离前夕对美国人大大为不满,抱怨美国人背信弃义,抛弃了越南:“美国人不是承诺了吗?只要我们言听计从,就帮我们清除祸乱?他们挑起了战争,现在厌战了,就出卖了我们。”那么,美国国内的美国人又如何呢?面对越南人在战争中遭受的种种苦难,他们是否表现出了应有的同情和怜悯呢?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譬如,在越战中,有许多生活在乡下的越南女孩在家乡饱受战火蹂躏后被迫来到城镇做娼妓,为美国大兵提供各种性服务。殊不知,恰恰是这些无耻的美国大兵用枪炮毁灭了她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然而,在美国,妻子们、姊妹们、女友们、母亲们、神职人员们、政客们……装作不知情,视而不见,闭口不谈,只管迎接他们的军人”,根本不关心越南人的死活和他们所面临的非人的生活境遇。后来,当越南人流亡到美国后,美国人也并没有真诚地向他们伸出援手。“我”随将军流落到美国后,为筹集复国计划的经费找到当地的一位国会议员。但他并非真心地关心这些越南人以及他们未卜的前途,而是为了从这些人手中捞取政治资本——选票,为个人的仕途铺路,这充分暴露出了他虚伪的丑恶嘴脸。凭借这些犀利的批判,阮清越毫不留情地撕下了美国人伪善的面具,砸毁了美国人在越战中高大的英雄形象。

其实,在《同情者》中,阮清越所观照的焦点归根结底还是谁来代表、再现越战以及越南人的问题。从阮清越对《现代启示录》的评判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好莱坞的虚构和再现方式是时刻保持戒备和排斥的。对他而言,好莱坞无异于是文化侵略的武器,是现代战争的同谋。他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指出,“美国拿电影当作讹诈世界各地防线的手段,好莱坞是急先锋,劲

头始终不减地用各种大片……甚至用票房当炸弹,轰炸世界各地观众的心理防线。观众看的影片讲述什么故事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观看而且迷上的影片讲的必须是美国故事。”因此,他在《同情者》这部小说中刻意安排了好莱坞导演拍摄越战电影的情节,并借此有力抨击了好莱坞式再现的侵略性和强权性及其对话语权的强占。



小说中,在菲律宾拍摄影片的过程就是一个制造美国故事的过程。尽管这是一部有关越战的影片,可据“我”的观察,整部影片连一个有像样台词的越南角色都没有,更令人上火的是,大名鼎鼎的电影导演连没有台词的越南人的叫声都没有搞对。后来,在“我”的据理力争下,导演终于同意增加了三个有台词的越南人角色,但可悲的是,没有一个角色是由越南或者越南裔演员出演的,因为以瓦奥莱特为代表的美国人认为“越南人没能力演越南人,我们必须被代表”。饰演这些角色的都是其他亚洲国家的人:饰演哥哥尹的是美国韩裔詹姆斯·尹,饰演弟弟的演员是一位菲律宾人,饰演妹妹梅的则是中英混血亚细亚·秀。从剧情上看,小说中的这部越战影片,像诸多好莱坞电影一样,充斥着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美国士兵不但拯救了整个越南,还赢得了越南少女梅的芳心,煞有介事地重复着西方拯救东方、西方英雄拯救东方美女的陈词滥调。为此,作为影片顾问的“我”在面对好莱坞这个文化侵略的庞然大物时不禁无奈地感叹道:“我以为,可以在越南人如何被代表一事上促使大导演做些实质性改变,到头来发现这只是幻想……我充其量是个制



衣工,保证一件衣服的一针一线不出差错。至于衣服的设计、生产、消费,都由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白种人掌控。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因而掌握了代表一切的资料,而我们(越南人)的最好结果永远都是,没名没姓死去前在一旁说上哪怕一个字。”

由此,阮清越在这部小说里真正所要做的就是为在越战中死难的300万越南同胞、为流落他乡的越南难民发声,从越南人自己的视角真正代表、再现越南人,展现给世界一个越南人的越战以及越战带给越南人的苦难和创伤。

在《同情者》中,逃亡路上的越南民众慌不择路,毫无任何体面可言,他们犹如动物和爬虫一样,人挤人,肉贴肉,龟缩在拥挤的机舱中。飘零到美国后,不计其数的越南难民或因生活所迫沦为奴隶和妓女,或因不堪生活的重负被冻死、饿死,或因难以承受精神压力而选择杀人或自杀。巴丹岛上的越南“船民”更是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状态极差,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更差:头发杂乱,粘连成结;皮肤像干枯树皮;嘴唇破裂;身体上东肿一块西肿一坨,散发出像条旱鸭子驾驶的拖网渔船散发出的气味”,俨然是一群毫无尊严的野人。流亡到美国的前南越军官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寄居在别人的国家,他们昔日的风光丧失殆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其中的很多人一天到晚在美国无所事事,生活的全部内容就只有两件事:一是等着领救济的日子,二是浑浑噩噩地打发无聊的时光。由此可见,越战之于越南人,绝不仅止于简单的失败。战争之殇带给越南难民以及他们后代的将会是陪伴终生的创痛,这诚如阮清越的文章标题所示,“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

对阮清越而言,越战从来都不是美国人的越战,而是一场真切切地发生在越南的国土上,给无数越南人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的越南人的越战,而且,这种难以言尽的伤痛还在所有越南难民及其后代的血脉中延续着。2017年,阮清越续写着他的越战故事,在其短篇小说集《难民》中继续以越南人的视角描绘着越南难民的众生相,言说着这场永远都不会结束的越南人的越战。

■ 动态

第二届斯拉夫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近日,第二届斯拉夫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高峰学科共同主办,主题为“移民学与斯拉夫学”。来自中、英、俄、日、法等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者就现代斯拉夫研究进程中的移民学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移民学因其研究对象范围广泛、研究机构各异、研究形式多样等原因,本身就带有跨学科的性质,其历史研究本身的复杂性、现实性首先冲击了现代斯拉夫研究进程,更在冷战结束后成为斯拉夫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围绕移民学与斯拉夫学,会议共分为三个单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历史语境中的移民文学批评;现代斯拉夫研究中的主题叙述问题。不同国家的学者希望通过探讨移民潮流在斯拉夫语境中的表现和发展来促进移民学学术领域研究的深入。

在分论坛“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中,与会学者就18—19世纪港口遗产与圣彼得堡的现代城市结构,近代上海文化构建中俄国移民的作用与影响、侨民文化、人文传统与后人人文主义等做了主题发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建华分析了20世纪20—40年代北京俄侨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其中展现出的中俄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伦敦大学教授玛·鲁宾斯探讨了人文主义传统自20世纪至21世纪是如何转变的以及在这种转变中侨民文学的作用,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广泛探讨。

在分论坛“历史语境中的移民文学批评”中,科罗拉多大学教授马克·利波维茨基通过分析侨民作家和来自自由环境的母国作家关于列宁格勒大围困的可比较文本来检测关于流散的概念,解释流散话语与母国话语在列宁格勒大围困中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带来的思考;吉林大学教授张广翔对百年来的中俄两国历史进行了细致探究解读;札幌大学教授岩本和久与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教授安达大辅则阐释了文学与舞蹈摄影在交流碰撞中产生的对话语权的妥协与平衡;京都大学教授中村唯史通过对语言学与诗学话语的阐发,展现出“历史语境中的移民文学批评”的不同形态,对移民文学批评中的自我建构具有启发性。

在分论坛“现代斯拉夫研究中的主题叙述问题”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林精华以俄国形式主义在美国和法国分别重新被研究并被激活的案例,论述了冷战时代西方文论繁荣与东欧苏俄侨民学者的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鲍捷通过对南斯拉夫解体后期的移民社会融合的挖掘,希望扩充斯拉夫文学研究的范围和纵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侯玮红追溯俄罗斯乡村散文渊源,提出了在当代对这一文学形式的思考;札幌大学教授宫川媚代以俄罗斯第一代移民年轻诗人鲍·波普拉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阿巴龙·别茨阿布拉佐夫》中的相关形象为例,分析了“静态”与“苦修”概念及其在“水”这一形象中的映射;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田洪敏就波兰现代斯拉夫研究过程中移民学概念的生成、其研究对象、相关现状等做出阐释。

在冷战结束后,伴随东欧作为地理与历史概念的重新解读,伴随俄罗斯学对于苏联学的替代,伴随斯拉夫学研究这一概念在俄罗斯、波兰、捷克等国家以及在欧美学界的变化,移民学成为斯拉夫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不容忽视的是,上述提及的国家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历史上有交集,在空间上有呼应,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具有世界历史与文化内涵的概念,是全球历史文化中的主题研究。此次会议探讨回顾了斯拉夫研究中移民学的产生、发展与流变过程,同时以跨国界、跨学科的角度分析了这一主题下蕴藏的不同领域的艺术特征,有助于进一步厘清移民学在现代斯拉夫研究进程中的学科地位以及研究前景,同时对于推进不同国家在现代斯拉夫研究上的沟通对话、交流合作也有所助益。

(王瑾)

■ 书 讯

译林社推出藤泽周平作品集

近日,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日本时代小说作家藤泽周平作品集(全12种)首批5种代表作,这是国内首次成规模引进藤泽周平作品系列。首批问世的5部作品为:短篇集《黄昏清兵卫》《隐剑孤影抄》《隐剑秋风抄》和被誉为“藤泽文学金字塔”的长篇小说《蝉时雨》,以及作家回忆写作生活的散文集《小说周边》。除《黄昏清兵卫》外,其余作品均为简体中文字版首次面市。

藤泽周平曾获日本直木奖、菊池宽奖、吉川英治文学奖、紫绶勋章等荣誉,其作品的精彩篇章被收入日本中学语文课本,大量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话剧。在译林出版社举行的“善刀而藏,这里有真正的日本”和“善刀而藏,日本武士的凡人歌”两场新书沙龙活动上,多位作家、编剧、书评人与读者分享了各自眼中藤泽周平的文学世界,畅谈了中日武侠文化的深层差异。藤泽周平作品的主要译介者李长声谈到,中国的武侠小说有江湖概念,武侠们活在江湖

上,而日本的武士活在真正的社会中。藤泽周平注重人情味,写的都是底层社会低级武士的悲欢。编剧史航表示,藤泽周平笔下那些人就是普通的武士,“这样的人物,你不太容易把他当英雄来看待,但是确实很值得回味,也容易让人想起自己的人生,他讲的都是屋檐下的人情和在小道上走着的时候发生的与命运有关的事情”。学者止庵认为,藤泽周平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家,他实际上写的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对自己特别不利的处境里生存,他无可奈何,又要表达自己,证明自己的身份和能力,特别像西方存在主义的想法。

藤泽周平一系列以底层武士为主角的小说的深层主题往往是底层人的尊严之战和凡人的傲骨。值得注意的是,与司马辽太郎等日本时代小说家的趣旨迥异,藤泽本人反感狂热与流行,鲜少歌颂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而是将目光投向无名众生。他笔下的武士更多是对个人尊严的捍卫、对小家庭的守护。



藤泽周平故事的舞台,经常是以家乡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为原型创造的一个背靠山坡面朝大海的雪国小藩“海坂藩”。作为虚构中的乌托邦,藤泽周平的“海坂藩”没有奇幻气质,而是一派写生的田园风光,投射着现代人内心深处的“乡愁”和“原生风景”,他的小说,借剑侠的外衣写遥远旧时代的人情,安慰的却是现代都市人的内心。(世文)

世纪文景推出最果夕日诗集《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

日前,世纪文景推出了日本新锐诗人最果夕日的代表性诗集《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的简体中文版。

最果夕日是近年日本诗坛活跃的年轻诗人,她身份神秘,不公开本名、长相,用手机写作诗歌,在社交网络上发表。最果夕日的诗歌承袭了前辈石川啄木、与谢野晶子“短歌文学”的形式,看似像散文或短故事,却以诗歌韵律形式表达对世间的看法。她的诗作以书写都市为主,关注底层人物,关注生命之原动力与涌动的热血,用锋利的笔触反映当代都市年轻人感情观、处世观,直戳孤独、冷漠的年轻人内心。

最果意为世界的终结,宇宙最偏远之境;夕日(タヒ)是作者本人指定译名,代表夕阳与朝日相遇,死而复生,日文タヒ(tahi)也有终结之意。《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作为最果夕日的代表作,2017年同名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

次进入中国读者视野。诗集中收录了“蓝色的诗”“早晨”“行星的诗”“首都高速公路的诗”“月亮表面的诗”“兔子移民”等43首诗作。诗集中,最果将视野聚焦于都市群体。她看到他们在都市中生活的同时,一直被都市同化,进而逐渐变得冷漠、孤独、缺爱,却不自知,用诗道出都市人最真实的自己。她希望自己的诗“能成为一个人发现自身可爱之处的微小契机”,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沉浸在孤独中的都市群体:“你要幸福”。日本作家角田光代认为:“这本诗集纤细地、针刺入骨般地渗入我的身体,狠狠刺痛我,却又带着别样的温柔。这些诗句,静静地,躺在这本小册子里。”

据了解,世纪文景还将陆续推出最果夕日系列作品,包括诗集《爱的接缝在此处》《致死亡系的我们》以及小说《成为星或兽的季节》和十几岁的人产生共鸣的家伙都是骗子》。